

从日记看清代士人的读书及儒学实践

李根亮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清代士人的读书既有实际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求知、求真和自我修身的精神需求及道德实践。从顺康年间的孙奇逢、陆陇其,到道咸同年间的潘道根、李棠阶、曾国藩,其日记中都有关于儒学书籍的阅读细节,从中可以了解他们的儒学思想,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省、自勉、自警、自律的儒学实践历程。

关键词:清代日记;读书;儒学实践

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2-0075-05

清代士人的读书既有实际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求知、求真和自我修身的精神需求。从孙奇逢、陆陇其、潘道根、李棠阶、曾国藩等清人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清代士人阅读儒学书籍的真实细节,了解其儒学思想观念,并能感受到他们自省、自勉、自警、自律的儒学实践过程。

一、应贫而贫即道:孙奇逢的读书与道德实践

孙奇逢(1585—1675)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爱国志士,曾参加过武装抗清活动。在明清两代,朝廷多次征聘他为官,都被他拒绝,因此他又被人称为“孙征君”。晚年他一直在苏门山夏峰村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其《日谱》是他晚年的日记,始于顺治六年(1649),至康熙十四年(1675)。该日记记录了孙奇逢的读书、创作、交游、师生问答等教学生活,尤其表现了孙奇逢的道德实践论,其中包括“收放心”工夫、读书安贫、应贫而贫即道、乐贫乐道等各方面。

顺治七年(1650)二月初四日,孙奇逢日记记载了他与学生王五修的对话,涉及到《孟子》的思想。针对王五修“杂念往来胸中,不能扫除”的问话,孙奇逢则提出一旦违背良知的杂念出现,必须“当下扫除”,不能犹豫和等待。孙还强调这种“收放心”的工

夫,与陆九渊所说的“先立乎大者”一样,都把道德实践放在第一位。^{[1](P29)}此后又有学生问孙奇逢读书与谋生的关系,孙奇逢指出:读书学习与谋生不矛盾,但却不必把物质追求看得太重,日常生活中“自有道在”,只不过要学会调停二者的关系,正如王阳明所说“能调停的此心无累”,也就是要随时随地扫除物欲的杂念,以平常心对待金钱、谋生等问题。

顺治七年(1650)三月初三日,孙奇逢在日记中记载了他与友人董正谊的对话,谈到了读书的方法。孙认为读书要从《大学》读起,并强调读书与做人是融为一体的,如读了孝、仁二字,但却不能“尽事亲之道”,没有恻隐之心,这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读书破万卷,也仍然是“不识字”。孙奇逢特别强调了读书安贫的观念,认为在困苦的环境中读书,更能考验人的品格:“实际正在此贫病拂逆,种种难堪处,不可轻易错过。”顺治七年五月,孙奇逢再次谈到如何看待贫贱的问题:“应贫而贫,应贱而贱即道也,即仁也。不以其道而贫贱,尚不可去,道中之贫贱而可去乎?不去仁者,不去此贫贱也。”这段话的核心就是强调要像颜回一样安贫乐道,因为真正追求仁义之道的君子是不可能富贵的,所以孙奇逢说“应贫而贫,应贱而贱即道也,即仁也”。当然孙奇逢并非鼓励士人以贫穷为荣,而是以能否忍受贫穷且能够“贫而无怨”作为衡量君子人格和操行的标准。

收稿日期:2019-08-23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红楼梦》阅读史研究”(2018076)

作者简介:李根亮(1964—),男,河南新密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

康熙十二年(1673),孙奇逢90岁,他在日记中又谈到孔颜乐处:“孔子之乐,曰蔬(疏)水曲肱而在这中。颜子之乐,曰箪瓢陋巷而不改。此分明是乐贫乐道,而曰非乐贫也,亦非乐道也,然则所乐者何物?亦曰乐学而已。”在孙奇逢看来,孔颜乐处的核心在于乐学,也就是“学然后乐,乐然后学。不乐不学,不学不乐”。

二、自处于仁、礼:陆陇其的读书和自勉

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是现存发现较早的清人日记。作者陆陇其是浙江平湖人,出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早年家贫,以坐馆为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为江南嘉定知县、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

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九(1657年9月16日),28岁的穷秀才陆陇其首次写日记,其中说他立志要读明人编写的《性理大全》一书。明人编写的《性理大全》是官方通行的儒经和理学丛书,陆陇其准备向友人借来一读。从日记中看出,陆陇其读书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有其更深层的精神需求的:“念功名虽属身外,然丈夫在世,岂应落落,揽辔澄清,非异人任。古人云‘志不在温饱’,今日之忧,岂为温饱哉?”^{[2](P1)}陆陇其又说:“圣经贤传,上足以明心见性,次足以匡时济众,其为纲也,岂不大哉?人自不学耳,学何负于人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勉之。”陆陇其将读圣贤书的目的上升到“明心见性”“匡时济众”的层次,并不断以此自省和自勉。

康熙八年(1669),也就是陆陇其考上进士的前一年,他在日记中发表了许多议论,表达了做人的道理。如在四月初八,陆陇其针对《中庸》“有余不敢尽”一语,强调了君子慎言、君子自省、君子自修等道德实践方式。甚至在面对小人时,他仍然强调要“自处于仁、礼”的境界:“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处之;有至刻者,在我不可以刻加之。惟自处于仁、礼可也。”这种以孔孟之仁、礼为核心的处事态度,其实是清初正统士人普遍的精神追求。

陆陇其在学术上欣赏朱熹,因而经常谈到朱熹,如在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廿六日,陆陇其阅读《性理大全》后抄录了朱熹的读书方法,并说道:“愚阅此,不觉爽然自省。向来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读之功少,所以学问不能长进,何可不自励也。”陆陇其因朱熹的读书法而想到自己“思之功多,而读之功少”,于是在自我反省中勉励自己努力求知求真。

陆陇其的读书和道德践行是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中的陆陇其为人坦荡,为官清廉,在清代初期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这显然与其受到儒学思想的长期熏陶不无关系。在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十一日,陆陇其读了张贞生撰写的《玉山遗响》一书,于是在日记中抄录了该书的一条内容:“孟我疆《山居》诗云:‘门外一川水,亭中数卷书。眼前多少事,谁道是幽居。’须知此事是何等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陆陇其抄录张载的这段话,显然也表现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

在顺康年间,清代士人面对时代变局,不得不思考安身立命的问题,于是他们想从儒家典籍中找到答案。他们的读书并非完全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像陆陇其一样,他们的读书、思考及其道德人格培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陆陇其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统文人和理学名臣的读书和道德实践的真实经历。

三、仁之为用:潘道根的读书和道德践行

在现存的清人日记中,值得重视的还有潘道根的《隐求堂日记》。潘道根,字确潜,号晚香、饭香,晚号徐村老农、饭香老人等,生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于咸丰八年(1858),江苏新阳县(今昆山)人,诸生。潘道根以教书行医为生,不以功名为念,晚年曾力辞孝廉方正之荐。一介贫儒的潘道根平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不遗余力表彰忠孝节烈,这与他一生受到的儒学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与陆陇其不同,潘道根一直是一个秀才,没有参加乡试,但却一直在读书,并在自食其力的乡村生活中,实践着儒家所欣赏的孔颜乐处之精神境界。

在与朋友的书信中,潘道根曾多次谈到了读书问题,如在《复倪磊岩札》一信中说道:“弟以为,惟贫与病乃可读书。”^{[3](P542~543)}面对贫病交加的环境,潘道根淡然处之,并声称“惟贫与病乃可读书”,这就有点安贫乐道、孔颜乐处的境界了。潘道根热爱读书,如在道光七年(1827)三月,他在日记中写诗,视书为自己的生命伴侣:“万钱买书堆云烟,百株种桃为墓田。生前把书花下饮,死后葬我桃花边。”他阅读的书籍,首先是四子六经等圣贤之书。他视其为耐吃的菜根。在如此困苦的生活中,潘道根仍然以读书问道为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这是现代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在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的日记里,潘道根说:“读好书,看好样,做好人。”在道光三十年

(1850)三月的日记中他又写诗道:“孔孟书尚存,读之每忘饭。”读孔孟书,就是读好书。读好书培养了潘道根乐天、空旷、达观的胸襟。潘道根的读书方法还影响了其子女的教育。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廿三日,潘道根记载了他携带孙子观赏田园风光的情景,“携孙男坐石桥看菜花。春光向晚,桃李已尽矣。小圃中雀梅尚盛开,菜与蚕豆俱花。蝴蝶成团飞舞,柴门寂静,人无至者,心境为之一清。”看到如此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色,潘道根随后有感而发,由大自然想到了仁与礼:“仁之为用,不过欲万物各得其所。礼之为物,不过使上下各循其分。”如《论语·雍也》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仁者乐山”其实包含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潘道根借机发挥,由大自然之和谐想到了仁之为用,而礼的作用则是实现这种自然和谐的催化剂。

潘道根记录了他对儒经的阅读及思考过程,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清代江南地区一介穷儒的精神变化。道光二十九年(1849),61岁的潘道根在日记中写道:“《大学》只言闲居为不善耳,闲居时有何不善可为?只是一种懒散精神,漫无着落处,便是万恶渊藪。”潘道根从微小的生活细节中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有我之私”“万恶渊藪”,于是感悟到一个真谛:“心在人欲上,便是放心;在天理上,便是收。”这种思考其实已将《大学》《孟子》的性善论与理学的观念融为一体。同年七月廿三日,潘道根日记又谈到《孟子》,认为“求放心”即是求仁:“学问之道,总所以求此心之仁而已。”

咸丰二年(1852)二月廿八日,潘道根日记抄录了《朱子语类》中关于“人须是有廉耻”的一段话,随后指出:“穷须是忍。忍到熟处,自无戚戚之念矣。”潘道根摘录朱熹、孟子的话是有针对性的,这与他自己的清贫生活环境是有关的。在穷困的生活压力下,一些人违背良知,没有了廉耻和羞恶之心,正如朱熹所言“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潘道根联系自己的环境,鼓励鞭策自己要懂得“穷须是忍”的道理,即使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也不能失去良知。

从潘道根日记看出,这种一边读书,一边自我鞭策的生活状态,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在咸丰五年(1855),潘道根已经67岁了,他在日记中又强调了“读书而志在圣贤”的道理,认为读书的目的首先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其次是齐家,而以猎取功名为目的的读书则是令人鄙视的。

四、破心中贼:李棠阶的读书和道德自警

李棠阶(1798—1865),河南河内(今属焦作)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授编修。道光二十二年(1842),督广东学政,擢太常寺少卿,后闲居在家,应邀主持武陟县河朔书院13年。同治元年(1862),清朝下诏起用旧臣,李棠阶应召到京城听用,后病逝于任上。据《清史稿·李棠阶传》:“棠阶初入翰林,即潜心理学,尝手抄汤斌遗书以自勖。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懈。”^{[4](P11740)}李棠阶一生潜心理学,勤学不辍,并以日记自省。

道光十四年(1834),李棠阶在顺天府任上做官。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五日,其日记提到他阅读和抄写《孟子》一事。在一边读书一边抄书的过程中,他想到了孟子的思想,想到孟子指点人们要认清自家的“真种子”。在李棠阶看来,这个真种子就是人的本心,就是每人都有着的善,也就是明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但是要得到这个良知,必须去除人的杂念、妄念、色念等等私欲。^{[5](P1)}因此李棠阶几乎每日都在写日记。他写日记其实就是他自省的方式。

身为理学家,李棠阶对《孟子》的阅读与其个人的自省、克己等道德实践工夫是融为一体的,他也常常联系他自己的生活动加以说明。如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初三日,李棠阶阅读《孟子·尽心》中“身不行道”章,于是有感而发:“不行道,虽妻子不能行。故道造端乎夫妇,而学道必自妻子始。”李棠阶之所以如此感慨,与他自己的夫妻生活有密切关系。李之原配去世后,续娶郑氏。在结婚之日,李棠阶于日记中提到:“俗以男女坐帐行合卺礼,殊属猥褻,非礼。余决意改之。”之后他在日记中又说:“窃思夫妇交拜,取敌体之义;而男先乎女,则夫为妻纲之义,亦宜先为训示。”李棠阶时时刻刻以儒家道德伦理规范来衡量自己,甚至认为男女行合卺礼也是非礼行为,只有夫妇交拜才体现了夫为妻纲之义。

查看李棠阶的日记,发现李棠阶对儒家道德伦理的践行近似于清教徒。他的日记将其每日的善行、杂念、色念等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然后又不断地鞭策自己。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十三日,其日记提到:“尚有色念三,真属可恶。皆因偶阅《聊斋》,逐物而动,已过犹不免留滞,以此见视听之不可不慎。”因为阅读《聊斋志异》,产生了对女人的非分之想,李棠阶于是在日记中加以自责。从阳明心学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反求诸心的方法。当人们的本

心被杂念、色念、妄念蒙蔽时,是看不到良知的光明的,只有不断清理这些欲念,才能恢复良知的光明。

李棠阶的反求诸心、自我反省始终贯穿于他的读书活动中。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十八日,李棠阶读了王阳明的文字后说道:“偶看阳明语,谓破心中贼难。诚然,奈何!便是浮气,又偶翻一条,谓学者须持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志,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荣辱,不管工夫有进有退,只是这良知主宰不息,久久自当有得力处。甚中予病。”“破心中贼难”一语出自王阳明《与杨仕德薛尚谦》,其中阳明曾寄书信于杨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6](P205)}“学者须持遁世无闷”一语出于《传习录》,原文云:“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6](P125)}以上王阳明的话语,其实是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告诉人们致良知的具体方式,强调道德践行的工夫。李棠阶摘录阳明之语,显然是因为切合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所以说“甚中予病”。后来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十二日,李棠阶再次阅读《传习录》:“看《传习录》只念念存天理,去人欲,便是实功。”

李棠阶是理学家、教育家、晚清大臣,虽然许多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很少提到他,但借助于他的日记,我们却可以感受到一个古代醇儒的阅读天地和精神世界。同治元年(1862),李棠阶被皇帝起用重新到京城做官。同治四年(1865),在其人生的最后一年,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阅读孔孟的书籍。

五、以圣人所言为用:曾国藩的读书和道德自律

曾国藩(1811—1872),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是晚清中兴名臣和理学家,是宋明理学的继承者和践行者。现存曾国藩日记始于道光十九年(1839),止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曾国藩后半生的主要经历。该日记内容丰富,是了解其日常生活、军事活动以及读书活动的直接资料,其中关于他的读书及自我反省等躬行实践的记录尤其值得重视。

曾国藩考上进士后的第二年,即开始每日写日记。这种习惯的形成,既受到当时文化风气的影响,也与晚清理学家唐鉴(镜海先生)有直接关系。如曾国藩日记提到,“镜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7](P47)}曾国藩自觉写日记其实也有同样的目的。道光二十一年

(1841)七月十四日,曾国藩亲自拜访唐鉴并“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就提及写日记之目的乃是“闭邪存诚”。

受到唐鉴的影响,曾国藩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的读书活动。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曾国藩买了《朱子全书》一部,随后在七月十二日、十三日、二十日、廿一日、廿二日的日记中都有阅读该书的记录。同年十一月到次年十一月,他开始集中阅读《大学》《周易》二书,尤其是对《周易》,他的日记中有更多的记录。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二日,曾国藩日记记载:“读《易·咸卦》。饭后昏昧,默坐半刻,即已成寐。神浊不振,一至于此。读《咸卦》,卦彖辞能解,《系传》释‘九四爻’,不知其意,浮浅可恨。”曾国藩阅读《周易》之《系传》“九四爻”,竟然不懂其含义,于是他责备自己浮浅昏浊。

曾国藩的儒经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和人格培养意义。由于感受到自己的浮浅和昏浊,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五日,曾国藩早起即高声朗诵《孟子》:“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初六日,其日记又说:“早,读《易·大壮卦》彖、大象,正与养气章通。爻辞无所得,心粗不入故也。”初八日,其日记云:“早,诵养气章。”曾国藩不断朗读《孟子》中“养气章”,从而激发了对孟子人格的仰慕,并决意终身私淑孟子,甚至希望死后能见到孟子,但想到自己如此昏浊,曾国藩又害怕自己背弃圣人,达不到圣人的要求。

曾国藩日记使我们看到并感受到了一个真实、丰富、感性的曾国藩形象及其精神世界。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十四日,曾国藩自称“心浮不能读书”,且当天有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于是在日记中自责不已:“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詖,其我之谓乎?”因为言不由衷地称赞他人的文章,曾国藩内心深以为耻,并以孔孟之语来解剖警醒自己。次日,曾国藩受到友人启发,体会到做人要以“敬”字为重,“‘敬’字是吃紧下手处”;然后联系到《周易·家人卦》所说“有孚威如”,《论语》所说“望之俨然”等语,并进一步强调“此第一要药。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十月廿四日,曾国藩继续读《周易》,但却不在状态,于是他感慨不已,不断自责。

曾国藩是深受宋明理学影响的道学家,这种身分促使他处处以儒家伦理观念来要求和约束自己。因而他的读书已不仅仅是为了求知、求博,反而更像一面镜子,不停地照射他的心灵深处。如在咸丰九

年(1859)十一月初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道:“思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所谓“以所言者为用”“以所言者勉诸身”,就是有意识地将圣人教导和思想作为衡量自身的标准。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并写在日记中:“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该对联本于《孟子》“夜气”章和《论语》“疏水曲肱”章,其意在于“以绝去桎梏营扰之私”。《孟子》“夜气”章强调人心修养之难,善心失去之易。《论语》“疏水曲肱”章欣赏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曾国藩在去世的前一年,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死亡的来临,因此说“死中求活,淡极乐生”。这种在生死关头的从容显然受到了孔孟儒学的直接影响。

六、结论

清代士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读书,尤其是对儒书

的阅读,是他们完善自我人格,实现其幽居慎独之功的儒学及道德实践方式。从孙奇逢日记中,可以真切认识到明末清初士人面对时代变局却无奈,不得不读书安贫,随遇而安的心境。从陆陇其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个正统文人和理学名臣自觉的道德自省自勉的真实细节。从潘道根日记中,可以感受到清代中期的一个穷秀才践行孔颜之乐的精神历程。从李棠阶的日记中,则可以看到一个晚清理学大臣近似清教徒的道德自警的精神变化记录。而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则可以感受到一个晚清大臣和道学家的道德自律,以及复杂的矛盾心态。

参考文献:

- [1]孙奇逢.孙奇逢集(下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2]陆陇其.三鱼堂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3]潘道根.潘道根日记(下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4]赵尔巽,等.清史稿(3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6]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7]曾国藩.曾国藩日记(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A Probe into the Qing Scholars' Reading and Confucian Practice from Their Diaries

Li Genliang

(Liberal Arts Colleg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Hubei)

Abstract: The Qing scholars' reading is not only for practical purposes, but also for their spiritual needs and moral practice of seeking knowledge, truth and self-cultivation. From Sun Qifeng and Lu Longqi in Shunkang period to Pan Daogen, Li Tangjie and Zeng Guofan in Daoxiantong period, their diaries contain details of reading Confucian books, from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their Confucian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their Confucian practice of introspection, self-encouragement, self-examin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in their daily life.

Key words: dairy in the Qing Dynasty; reading;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